

序 论

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①。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其经济思想。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叶的近代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出现的。

近代政治经济学开始时期的古典学派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为任务。“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②。但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到此为止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自然和永恒的社会制度，从而既不能在正面的阐述中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予以辩证的、历史的评析，又不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③。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上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④。此后，辩证的意图代替了科学的探讨，庸俗经济学代替了古典经济学而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页。

③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4页。

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8页。

的统治思想。时代的要求为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和发展提出了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标志着经济科学的革命变革。它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①，从而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它是近代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十七世纪中叶，完成于十九世纪初。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但它还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开端。对资本主义作最初理论研究的是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下半叶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这一时代的商业资本要求的反映。商业资本是近代产业资本的直接前提。但商业资本本身不能创造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前提的作用取决于当时一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说过：“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②；如果这个时期“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末，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①。由于在欧洲封建制度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已孕育在封建制度的内部，商业资本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准备条件。但所不可忽视的是商业资本，作为谋求一个国家物质利益的力量，取得了逐渐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利润，作为首先以让渡收入的国际贸易利润出现的资本收入和其派生的利息，取得了公开的确证，打破了从古代一直遗留下来的对于商人资本和高利贷的偏见。

古典经济学是产业资本要求的反映。产业资本是“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的“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②，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新范畴。它既不同于古代或中古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也不同于作为它的直接前提的封建末期的商业资本。

古典经济学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基本任务。但在十八世纪末年以前，它却同时又强烈地反对反映商业资本要求的重商主义。一方面，在特权、垄断、国家干涉等问题上，重商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其共性，而经济自由主义为追求经济剥削自由的产业资本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虽然在本质上和封建主义对立，但在政策推行上，又和封建王朝有密切的关系。在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是由商业资本家发动的，但却要求并得到王权的大力支持。在法国，作为结合国库利益、巩固专制制度的措施，它几乎完全由政府发动、执行。所以，在这个时期，反对封建主义必然反对重商主义，而反对重商主义也意味着反对封建主义。

^① 同上书，第 372 页。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488 页。

古典经济学者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所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观点，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制度，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当作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普遍规律，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缺点。这个缺点是他们许多理论错误的根本原因。他们这种超历史观点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不能进一步从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反面叙述来完成恩格斯所称的，“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①的狭义政治经济学。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年)和皮埃尔·布阿吉贝尔(1646—1714年)是英法两国早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②。马克思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③。

配第和布阿吉贝尔都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说过：“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④。他们都是在对当时英、法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具体经济问题所作的分析和建议中，提出了片断的经济理论的。其中最重要的，如他们所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4页。

② 配第的主要著作作为《赋税论》(1662年)、《政治算术》(1690年)、《爱尔兰政治解剖》(1691年)、《货币略论》(1695年)。布阿吉贝尔的主要著作作为《法兰西详情》(1695年)、《谷物论》、《货币缺乏的原因》、《论财富、货币、租税的性质》等(约在1697—1707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0—751页。

别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最根本命题，和配第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表述形式的地租论和利息论等，都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①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的理论标识着这个过渡的开端。在这以前的重商主义者站在商人立场上考察商业资本运动。商业资本虽然剥削劳动但不组织劳动。所以他们所研究的只是流通领域，所注意的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商品间和商品所有者间的交换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取代商业资本的产业资本不但剥削劳动还组织劳动，而且恰恰是通过组织劳动而剥削劳动。反映产业资本要求的古典学派的理论分析必然要从流通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他们所注意的必然要透过事物外表的交换关系，发现反映事物本质的生产关系。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过渡也就以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向生产关系的过渡为特征。

诚然，马克思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曾经提出：由于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生产者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②。他又说：“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1页。

但是，不能把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还没有消除商品拜物教外观一事解释为古典学派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时，还没有透过对交换关系的表象考察进入到生产关系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另一个地方明白地写道：“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①。马克思还说过，李嘉图曾指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②。

配第要在“政治价格”后面找出“自然价格”，布阿吉尔贝尔则要在“市场价格”后面找出“真正价值”。对他们来说，“政治价格”或“市场价格”只是交换关系，是表象，而作为市场交换关系的基础的“自然价格”或“真正价值”的探讨，则把理论带入了生产领域，涉及于人作为生产者，劳动作为生产因素间的关系。布阿吉尔贝尔对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解释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③。这意味着在存在着灵活市场价格和行业间劳动和资本的自由转移条件下，资本能在不同的产业部门间，依照市场对于不同商品的需求，自由调配劳动，以取得其最有效的利用，从而不但保证在全部生产范围内工资和利润的平均化，而且保证市场中商品交换的比例符合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的比例。因此，交换的关系反

① 同上书，第 98 页注(3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50 页

③ 同上书，第 43—44 页

映了生产的关系，前者受后者的制约。古典学派的其他关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研究都是以这一基本认识为起点的。

我们应当肯定古典学派突破重商主义者囿于交换关系考察的局限，进入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研究的科学意义。这个转变开了此后确认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先河。但是古典学派没完成这个转变过程。首先，他们仍然不能摆脱物的外观的迷惑。在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联系时，他们只注意于各经济范畴之间量的关系的分析，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质的关系。其次，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虽然他们的论述涉及了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对立，但他们却把这种阶级关系看作自然决定的关系。其三，虽然他们所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他们却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一般的生产关系，从而他们的研究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就取消了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研究的灵魂。

必须指出，古典学派之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背离了古典学派在研究方向上所实现的转变。李嘉图之后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倾向是放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探讨，或者说，把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又恢复或缩小到抽象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交换关系。这个庸俗化的过程，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已臻完成。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问题上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深化作用。因此，在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年代，这也成为对古典学派批判继承的经济学科学变革的一个关键。

以弗朗斯瓦·魁奈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年 和罗伯

特·杜尔哥 (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1727—1781 年) 为代表^① 的法国重农学派出现于十八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 比布阿吉尔贝尔约晚半个世纪。重农主义体系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

马克思揭露了重农主义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写道: “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②。它“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③。但是马克思又指出重农主义者, 尤其是魁奈的“经济学家”派的理论带有浓厚的封建外观; “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 “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 ……这样, 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 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④。这个外观不但欺骗了别人也迷惑了他们自己。他们所刻划的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他们却认为他们只是要求对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作些改良。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基础。它是在当时法国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启蒙学派所企求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重农主义者的自然秩序, 同样地也只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但它却以封建的外观出现。首先, 他们认为自然秩序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安排的秩序, 是

① 魁奈的主要经济著作作为《租地农场主论》(1756年), 《谷物论》(1757年), 《经济表》(1758年) 杜尔哥的主要经济著作作为《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8页。

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3、24页

神的意志的体现。其次，他们把认识自然秩序和根据自然秩序来制定人为秩序的责任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甚至如杜尔哥这样一个在其理论体系中似乎消除了封建外观的人物，也未能摆脱一般重农主义者的这种幻想，而把中国皇帝理想化为体现自然秩序的“开明君主”的典型化身。

封建外观掩盖但没有抹煞自然秩序学说体现资产阶级要求的本质。重农主义者把自然秩序和他们所认为的违反自然秩序的、处于疾病状态的法国当时社会的人为秩序对立起来，就是把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对立起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后者。这样，他们就在当时剧烈的阶级斗争中，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

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明显地确认了在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为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是重农主义者的科学功绩。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只是丢掉封建外观的自然秩序。李嘉图摒弃了自然秩序而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但他的体系也完全建立在确认自然规律的存在的基础上。这个认识已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这一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它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测

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本来是他在 1766 年底为两个在法国留学行将回国的中国学生写的。当时一般重农主义者都认为中国是开明统治的故乡，中国的“天子”是“开明君子”的典型。这两个学生被委托于回国后，将中国国内情况向法国的师友提出报告，以印证他们这种幻想。杜尔哥草拟了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在报告中作答。为了使他们明了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他在问题前写了一篇分析性的引言。1769 年，由于杜邦·德·奈穆尔的劝说，杜尔哥将这篇文章投稿于奈穆尔主编的重农学派的刊物《公民历书》。分期登载于 1769 年的 11、12 月号和 1770 年的 4 月号。

定的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范畴之间有其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存在着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经济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上面的。

重农学派的错误，同时也是一切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因此，他们也就把仅仅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当作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①。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特点和民族传统。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辩护人。重农主义者则把这一观点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以“纯产品”学说为这一观点的理论支柱。在表面上，重农主义者重视农业的主张似乎只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而提出的对改良农业地位的呼吁。他们以重农反对重商，猛烈地批评重商主义。在表面上，他们又似乎只是维护一般农业的立场而反对商业。但在这个外观下面，不难看到重农主义者所说的农业并不是当时还基本上存在于法国各地区的封建农业，而是在法国北部某些地区刚刚露出苗头的、和封建农业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农业。魁奈的《经济表》所描绘的农业，既不是农奴制的或者仍处于半农奴制形态的封建农业，也不是自耕农，甚至贫小佃农的小农业，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租地经营大农场的大农业。这种大农业就是魁奈的社会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15页。

阶级分析的出发点 就是他的“纯产品”学说的基础。而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又是以这种大农业的存在为既定条件的。还可以进一步说，重农主义者对农业呼吁也还只是一个形式。他们的体系实质上反映着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生产取代封建主义生产的要求。由于在“柯尔培尔主义”^①扶植下，法国工商业靠牺牲农业而发展，在当时经济生活和人们意识中，农业是和工商业对立的；由于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破产所引起的农村中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农业在北部地区的开始滋长，又给人们以对于农业的错觉；“经济学家”们就臆想以新农业来改造封建制度。这个新途径，实际上是通过发展农业来发展资本主义，以农业资本主义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所以马克思说：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物品，而且也创造它们的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获得剩余价值”^②。

以农业资本主义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充分表现在以农业资本来概括资本。魁奈在《经济表》中 就曾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物质组成部分（工具、原料等等）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并一般地确定了资

① 柯尔培尔（一译柯尔柏，1619—1683年），1615年起任法国财政大臣，并逐渐成为宫廷内外政策的实际决策人。任内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争取贸易顺差，增加国库收入。还兴办“王家”手工工场，发展商业和运输业，创立专利特权公司，加强掠夺殖民地。柯尔培尔主义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能根本改变其封建主义的基础。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联系。

范畴式的分析并不妨碍魁奈等人采取一些独特的形式以阐明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大农和小农，大耕作和小耕作的划分是他们阐明资本作用的出发点。在《经济表》中，大耕作已经是一个假设。二者的划分首见于魁奈发表于《百科全书》的两篇论文（《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中。在这两篇论文中，他区别了三种耕作技术：只用人力的耕种技术，牛拉犁耕作技术，马拉犁耕作技术。他立即把人力耕作技术排除出去，认为这种耕作技术产量最低，农民终年劳苦所得仅足糊口，不生产任何“纯产品”，从而也不提供地租。后两种耕作技术产量较大。农民除了维持生活并进行再生产外，还有剩余产品能够提供地租。魁奈对这两种耕作技术的效果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他认为牛耕技术所生产的“纯产品”从而所能提供的地租量，约为年预付的 30% 而强，而马耕技术所生产的“纯产品”亦即所能提供的地租量，约为年预付的 100% 而弱。魁奈称牛耕为小耕作而称马耕为大耕作。从为地主利益着想的角度出发，魁奈认为最有利于地主的做法是把土地租给能提供大量资金，采用马耕经营的农民，亦即租地农场主。只有在找不到租地农场主时，地主才采用分益佃农制，把土地交给分益佃农耕种，由地主提供牛耕的投资。魁奈的基本的《经济表》（见于 1758—1759 年的一二三版，1766 年的《经济表解释》等版本）以比例于年预付的 100% “纯产品”为假设，也就是以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主义大农业为对象。所以，《经济表》所描述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农业。虽然它以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作为以流通为媒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承担者的三个社会阶级，但它实际上已把“生产”劳动的直接剥削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和那些剩余价值的单纯

占有者区别开来了^①。

值得注意的是，魁奈的三种农业耕作技术的分析，实际上把以地租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和投资于农业的资本联系起来。一般说来，重农主义者都不大着意于解答为什么只有农业才产生“纯产品”的问题。魁奈的《经济表》在对比农业和工商业时也是以之为假定的。他们总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现实。但在许多重农主义者著作中，仍然不难列举诸如“土地是一切产品的源泉”^②，除用于土地者外，任何其他劳动都是不生产的，因为人不是创造者”。“‘纯产品’是土地给与耕作者的纯礼物”^③甚至“土地的产力来自造物主的权能”^④等一类说法。所以，如果重农主义者被要求对“纯产品”的来源作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他们只能把它归结为土地自然力的赐予。但实际上，“自然赐予”的观点还是一个外观。它是“纯产品”源于土地的自然产力、以地主为土地的所有者两个前提，为“纯产品”应以地租的形式归于地主的论证服务的。从魁奈的上述论文所作的农业耕作技术分析中，就会发觉农业的增产不依存于土地的自然产力，而依存于技术上的集约投资，“纯产品”不是“自然的赐予”而是农业资本的收益。因为，只用人力的耕作是没有投资或投资极少的农业，它不生产“纯产品”。牛耕或小耕作是投资较少的农业，它生产较少量的“纯产品”。马耕或大耕作是投资大的资本主义农业，它生产大量的“纯产品”。土地的自然产力是一个恒量，但“纯产品”却由于投资的有无和集约程度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别。因此，“纯产品”的有无和多寡并不系于土地生产力，而系于在同一土地上投资的有无和大小。

在一定意义上，魁奈对于以地租为代表的剩余产品的解释比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后来的李嘉图更重视资本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侧重于说明级差地租的李嘉图，强调耕作良地、次地的农民总是以等量于耕作劣地者的资本，分别获得较大量的产物，但却认为“用铁铧工作在农场工作中不再使用马和牛”^①可能只减少 1/10 的农产物量。魁奈则认为这种只用人力的铧耕将会完全消灭任何维持最低生活以上的剩余产物。为了论证投资的关键性，魁奈排除了级差分析，把土地肥瘠的区别都抽象掉了。在上述的两篇论文中，他还明确地认为土地和劳动的缺少不构成对农业生产的障碍。他在多处指出在当时农业凋敝的法国，存在着没有充分利用的荒地和得不到工作的农业劳动者。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引用大耕作技术。魁奈既以资本主义农业概括资本主义生产，以租地农场主代表资产阶级，也就很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把“纯产品”或剩余价值归结为投资的收益。

魁奈没有追究租地农场主的原始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却对在连续生产过程中，农业资本的补偿和积累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租地农场主起了指导经济运动的作用，则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运动的范围内，土地所有者却起了左右生产本身的作用。在《经济表》中，土地所有者不仅仅是消极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和享受者，而实负有左右资本积累，促进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任务。独特的是，这个任务的完成不是通过储蓄而是通过土地所有者的消费。为了消费，土地所有者以一部分的地租收入向生产阶级购买农产品，以余下那一部分的地租收入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都从土地所有者的支付中得

^①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35 页。

到补偿其上一年度的年预付的损耗。但由于只有农业是生产部门，只有农业的年预付才产生“纯产品”，所有只有用于购买农业产品的支出，才构成了下一年度的社会投资。可以说，魁奈认为把地租收入用于购买农产品那一部分的支出是“生产消费”，而用于购买工业品那一部分的支出是“不生产消费”。只有前者才导致新的收入再生产。

魁奈在分析土地所有者对于这两类支出不同比例的抉择时，论证了地主在增进资本积累和促进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魁奈先假定一个中间的情况作为出发点。在“纯产品”（收入再生产）率为“年预付”的 100% 的前提下，魁奈假定以土地所有者为首的社会各阶级用收入的 50% 来购买农产品，用收入的另一个 50% 来购买工业品；则翌年农工业的再投资将和上一年度相同；再生产只能在原有规模上进行；社会收入（“纯产品”）的再生产规模也和上年一样。简言之，对两类支出的比例作这样的抉择的结果是简单再生产。

但是魁奈认为这种生产性支出不生产性支出的比例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以土地所有者为首的社会各阶级以大于 50% 的收入购买工业品，而以小于 50% 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则翌年的工业投资将增加，而农业投资将会减少。相反地，如果他们决定以大于 50% 的收入购买农产品，而以小于 50% 的收入购买工业品，则翌年的农业投资将会增加而工业投资将会减少。由于只有农业才生产“纯产品”，翌年农业投资的减少将会相应地减少翌年的“纯产品”。而翌年农业投资的增加将会相应地增加翌年的“纯产品”。换言之前者缩小社会再生产后者扩大社会再生产。当然在讲到生产性和不生产性支出增减的抉择时，魁奈是把三个阶级相提并论的。但由于土地所有者阶级占有全部“纯产品”而其他两个阶级对

于两类支出消长的规模又以土地所有者创始的改变为条件，土地所有者的抉择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的形成，收入再生产的规模，社会总生产的消长也主要地系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消费”和“不生产消费”倾向的变动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土地所有者实质上是资本家”^①。所以，虽然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指导着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活动，但土地所有者却是以促进资本积累，左右生产投资的真正资本家的职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虽然“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②，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资本的本质，并不认识资本的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的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魁奈的《经济表》是在还没有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概念前，便企图对资本运动过程进行分析的尝试。而使他赋予土地所有者以资本家所固有的积累的职能的封建外观，既无助于确立资本家的地位，也无助于认识利润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年是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指出，在这一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③。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181页。

斯密是产业资本的代言人。在当时的英国，产业资本已开始跃居首位，但它所控制的大生产的主导形式还是工场手工业。小生产的比重还非常大；工场手工业是不能把小生产完全排除掉的。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过程不断地加速进行，但它还有强大的影响，还控制着小生产。作为产业资本代言人的斯密，为了全力支持大工业的发展和产业资本的完全统治，不得不和仍然横梗在大资本发展道路上的、发源于封建行会和同业公会的残余制度以及在国际贸易上仍然具有一定影响的干涉主义政策进行斗争。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当然，如上面已说过的，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完全摆脱了重农主义自然秩序封建外观的经济自由主义。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国家的财富为研究的对象，而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富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全书的研究顺序是首先树立正面的理论体系，然后对历史经验和过去各种错误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进行评论和批判；它以对私人经济的讨论分析为主而兼及于国家经济。斯密所称的国富，实际上，是由商品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同于前人的是斯密不以某种特殊的劳动，而以劳动一般为财富的源泉从而更直接而全面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

这本书共分为五篇，理论部分集中于第一和第二篇。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增进国富的生产中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斯密认为国富的增长系于两个条件：劳动的生产力和从事于生产劳动的人数。

在第一篇中，斯密考察了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因素的问题。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